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勇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普及读物

英雄之城—— 大轰炸下的重庆

主 编◎王川平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普及读物

英雄之城—— 大轰炸下的重庆

主编(策划): 王川平

统 稿: 张荣祥

图 文: 李金荣 衡元庆

资 料: 马 捷 肖时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之城——大轰炸下的重庆 /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1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229-03765-9

I. 英… II. 重… III. 日本—侵华事件—史料—重庆市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7930 号

英雄之城——大轰炸下的重庆

YINGXIONG ZHI CHENG——DA HONGZHA XIA DE CHONGQING
王川平 主编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曾海龙 汪小瑞
责任校对: 郑小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陈永 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40mm×1 030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61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765-9

定价: 36.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总 主 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马 振 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 川 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王 建 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方 德 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巴 斯 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西村成雄 日本放送大学教授

朱 汉 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任 竞 重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任 贵 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主编

齐 世 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 庭 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汤 重 南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步 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何 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麦 金 农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 玛玛耶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
- 陆大钺 重庆市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
- 李红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历史研究》副主编
-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主编
-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杨瑞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张国祚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教授
-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编审
- 陈谦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陈鹏仁 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 邵铭煌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 罗小卫 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
- 周永林 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 荣维木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徐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徐秀丽 《近代史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郭德宏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傅 高 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温 贤 美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谢 本 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简 笙 簧 台湾国史馆纂修
廖 心 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熊 宗 仁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潘 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魏 宏 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高建 刘志平 别必亮 何 林 黄晓冬 曾海龙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 1937 年冬到 1946 年夏前后将近 9 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 5 年,在铜梁 201 师 603 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 年暮春,我在 57 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

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这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骄傲

——序《英雄之城——大轰炸下的重庆》

王川平

写下《英雄之城——大轰炸下的重庆》书名的时候，一种爽朗的感觉油然而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60年了。连同打鬼子的日子算起，枝枝蔓蔓几乎涉及三四代人。包括抗战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良知战胜愚昧、和平战胜杀戮的全人类的大事。这一次，中国站在正义、光明、良知、和平的一边，与世界人民一道共享胜利的荣耀，取得了民族保卫战的伟大胜利，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中华民族开始走上复兴之路。

在这一场民族保卫战中，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和陪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指挥中心，作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政治舞台，作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重要的交汇点，作为中国民主党派的重要发祥地，遭受了日本军国主义历时五年多、近三百次的狂轰滥炸。在大轰炸的高压下，重庆愈炸愈强，巍然屹立，成为胜利的象征并最终赢得了胜利，铸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中这辉煌的一页。

这是重庆的荣耀，但这不仅仅是重庆的。在今天，当我们横跨海峡两岸，站在全民族的高度，回首抗战首都与陪都浓烟滚滚的岁月，回首那曾经的共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历史画面，一定会有新的教益等待我们去发现。在今天，当我们站在全人类的高度，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面对战争、危机、灾害

等林林总总,回首当年共同走过的道路,也一定会从中发现些什么,这种发现会有利于我们走好未来的路。不管世界多么神秘,不管未来多么神秘,有些东西是具有长久价值的,它们是正义、光明、良知与和平。

二十多年前就想编一本这样的书。当你捧上本书时,细心的你会发现,我们民族的包容性、韧性和趣味性可见一斑。历史在不断变化着,而且越变越好。我对此深信不疑。

综 述

张荣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动员最广、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牺牲最惨重而取得了完全胜利的一次民族保卫战争。中国人民用壮志和热血为中华民族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备受蹂躏的历史谱写了终结篇。这一胜利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近代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人民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空前的民族团结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因此,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指挥中心,以其坚毅的勇气、巨大的牺牲和卓越的奋斗,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有学者讲,“不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就不能完整地了解中华民族和近代史”。

一、战时首都。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中国共产党和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的中心

1937 年 7 月抗战爆发后,继淞沪会战失利、南京战事吃紧,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公开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到 1938 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驻重庆,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所在地。1940 年 9 月 6 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明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政府迁都重

庆,这在中国迁都史上实为破天荒第一次。与此同时发生的民族救亡大迁徙,以及较早前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北上转移,成为中华民族转危为安、从积弱走向自强的历史转折点。

随即,从白山黑水到黄河两岸,从中原大地到苏杭上海,从江汉平原到岭南珠江,数千万不愿做亡国奴的沦陷区同胞离乡背井,扶老携幼,往重庆移动,往大后方移动,第一次汇聚成由东往西、从沿海往内地的民族大迁徙。其悲壮和惨烈,可与“出埃及记”、“敦刻尔克撤退”相比。

国府移渝,民族工业随之内迁,中国原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重心,便以长江为中轴,由东部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大西部地区转移。460多家工厂内迁,其中,迁渝工厂243家,加上为适应抗战需要新建的一批工厂,使重庆全市工矿企业增至1690家,工人达10万人,占当时国统区总数的三分之一。重庆的工业结构由以轻工业为主,转变成以重工业为主,初步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实力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抗战时期我国最重要、最集中的重庆工业区。这不仅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脊梁”,改变了中国近代产业结构分布不合理的状况,同时也打下了重庆城市近代化的物质基础,对重庆乃至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从1938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新修和改善道路,重庆在干线基础上与附近地区进一步联结成网。为解决国际运输,国民政府还先后修筑了中越、中缅、中印等公路,加强了与英美等国的军事物资联系。水运、航空、驿运也得到极大的发展。金融业方面,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等公私银行和各地方法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纷纷迁渝,重庆的金融业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着领导作用。

中国著名高等学府、科研院所、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艺术团体相继移往重庆,成千上万名教授、学者、专家、诗人、记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几十万流亡学生颠沛流离,踏上了史所空前的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转移的悲壮征程。在重庆,中国知识分子秉承爱国主义传统,不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抗战文化,留下了丰厚深湛的文化遗产;而且为新中国的建设,保护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科技、教育、文化中心的西迁,对于学术文化长期不够发达的重庆来

说,无疑是一场空前的洗礼和启蒙。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美、苏、英、法、加、澳等 30 余国驻华使馆驻节重庆,世界著名通讯社、报社以及几十个反法西斯反战国际机构、团体也先后往重庆派驻机构,重庆成为世界了解战斗中国的重要窗口和外交平台。由此,重庆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①。

自此,重庆从战前普通的省辖市跃升为中国战时首都,从长江上游的商埠码头跃升为中国抗战大后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中心。而同时,重庆也成为了日机“政略”和“战略”轰炸的重要目标。在 1938 年 2 月至 1944 年年底长达近 7 年的日子里,日机对重庆进行了“地毯式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其中最猛烈的阶段集中在 1939 年、1940 年、1941 年三个年份。日本在三年中分别实施了代号为“100 作战”、“101 作战”、“102 作战”的残暴空中屠杀。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对重庆战区的轰炸,共出动飞机 9513 架次,实施轰炸 218 次,投弹 21593 枚,炸死市民 11889 人,炸伤 14100 人,炸毁房屋 17608 幢。在灾难岁月中,重庆市民在居民区、电影院、商店、学校、教堂、寺庙、机关、使馆、工厂被杀害;数十万人从以上的地点中被驱赶出来,在残酷和溽暑的昼夜里,在被炸烂的大街和废墟上颠沛流浪,恐慌度日。在著名的 1939 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中,仅仅两天,伤亡总数就达 6314 人之巨。之后,从 5 月 5 日到 7 日三天中,25 万人疏散出城,失去家园和产业、学业、事业、职业,以至后来人们提到重庆,总是忘怀不了在重庆“跑警报”的悲愤岁月。1941 年,长期不间断的连续空袭战术,导致 6 月 5 日夜“大隧道窒息惨案”发生。死者枕藉,举国同悲。

重庆经受住了狂轰滥炸,屹立在中国抗战大后方,成为中国坚不可摧的战时首都。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挫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图谋,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立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坚忍不拔的国际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老舍在《“五四”之夜》中感慨万千:

^① 此句为 1942 年 6 月 15 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讲时所说。——编者注

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

著名时评家徐盈在《重庆——世界与中国的名城》一书中写道:

四方仰望着的重庆,实在已逐渐成为中国的心脏与脑髓,堪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吸引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意志,将他有强力的电波,指挥着全国。……肉眼看不出的潜力,习俗中找不出的坚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赞叹声中,走上了命定的光荣之途。重庆戴上了伟大的花冠。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它,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它,这是我们无可再退的堡垒,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

二、统战舞台。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舞台。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创造性地实践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维系国共合作,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亲自缔造了彪炳千秋的“红岩精神”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高层频繁会晤并多次发表讲话、声明。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至此,由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以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广泛参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9年1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成立,同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积极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为维系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重庆成为大后方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阵地。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战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尖锐

对立的政治斗争中,缔造并培育了辉映千秋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包括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四个方面,其基本内涵体现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与作风的继承和发扬,特别是延安精神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充分展示和伟大升华,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宝库中独具风采的璀璨明珠。

从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发展史的角度看,1938年3月,在全国人民要求下设立的国民参政会,作为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组成的最高咨询机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重庆召开了11次会议,经历了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过程。在抗战胜利前夕,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主题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及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国共重庆谈判,为重庆作为第二条战线的重要阵地,作了思想准备并培育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在重庆的纷纷建立,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的召开,为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多党合作为基础的政治协商制度创建,作了有益的探索,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至深且远。

三、东方堡垒。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所在地,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捍卫人类正义与和平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重庆因此成为蜚声世界的反法西斯名城,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象征

1929年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并迅速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国点燃。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从而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保卫战争。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公开发表《移驻重庆宣言》,重庆随即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作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指挥中枢,重庆直接领导了中国辽阔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如1939年的海南岛、南昌、随枣、桂南和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的枣宜作战,1941年的豫南、晋南、上高和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不仅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争取了加强战备的宝贵时间,而且直接减轻了苏联东面的压力,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对日(并同时向德、意)宣战。23日,中、美、英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史称“东亚军事会议”),正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中国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中国作为最早的反法西斯国家,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1941年底,日本总兵力的55%以上,陆军兵力的60%以上被钳制在中国,中国担负着抗击日军主力的任务。1942年1月3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在重庆正式成立,蒋介石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同时兼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指挥中心,负责指挥中国、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国的抗日战争。从1942年至1945年5月,中、美、英三国所举行的关于对日作战的高级将领军事会议都在重庆举行。至1945年春,中国牵制着200多万人以上的日军。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去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因此,中国战场在当时整个世界战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各同盟国协定,在中国战区内的中国和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的日军128万人,均向中国投降。

1943年1月,美、英两国声明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各项特权,在华盛顿